

景觀

巴黎金門宮：從殖民地博覽會到移民歷史博物館

● 吳子祺

本屆〔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應當彰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外擴張的顯赫榮耀，以及各文明國家為了人類進步這一目標而在殖民地所做的努力。

——法國前殖民地部長、時任國會議員薩羅 (Albert-Pierre Sarraut)
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致辭①

總統〔我〕希望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可向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民眾藝術歸還正義，重新認識其在世界遺產中的地位，並且有助於發展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必要對話。

——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2006年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揭幕演講②

七年了，終於迎來一場正式開館儀式。今天有這座〔移民歷史〕博物館在此，法國就擁有一座旨在保存和弘揚移民文化價值的機構，展示和衡量移民及其後代為我們國家帶來的貢獻。

——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2014年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的揭幕演講③

一 法蘭西殖民帝國的 巔峰之作

位於巴黎東部第十二區的金門宮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原是為了1931年的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而建。當時法蘭西帝國的殖民擴張和統治達到頂峰，第三共和國政府大舉投入此次博覽會，旨在向世界展示其在非洲、大洋洲、中東和遠東推行「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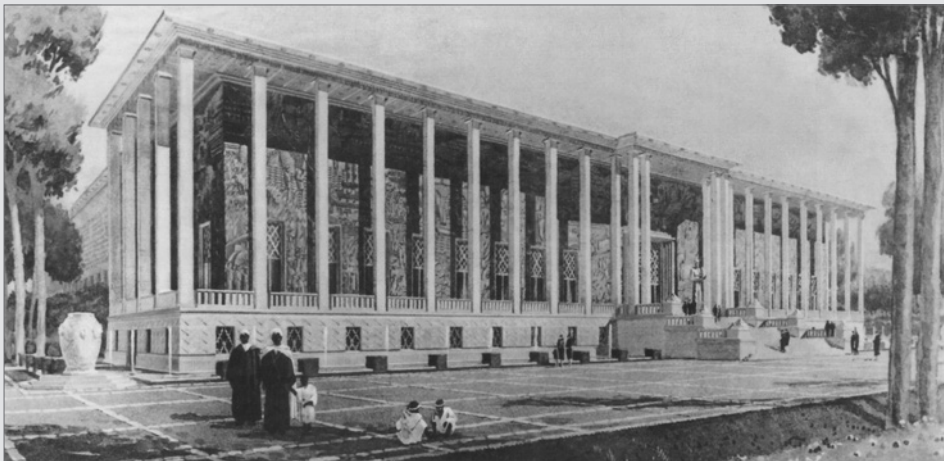
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 的成就以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潛力。以大型博覽會的形式展示和推廣殖民主義，是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帝國階段，並在世界各地作大規模海外擴張的一種宣傳方式。殖民地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消費主義緊密結合，使其成為各殖民者既相互觀摩，又彼此競爭交鋒的場域④。而法國對舉辦殖民地博覽會尤為熱衷，既

有在本國舉辦的海外殖民地博覽會，亦有在殖民地舉辦的專門博覽會。就法國本土而言，1906和1922年兩度在南部海港城市馬賽舉辦殖民地博覽會，都引起甚為轟動的效果，吸引大量海內外觀眾流連參觀。此類博覽會不僅有效宣傳法屬殖民地，又使得宣導海外擴張的政治人物能夠通過有目的、有策略和有組織的陳列方式，以及豐富多樣的節目安排，以形成配合殖民主義的知識體系和大眾文化，從而鞏固法國殖民管治的正當性。

1931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殖民地博覽會可謂法蘭西殖民帝國的巔峰之作。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積極參與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一方面，其殖民主義經過前殖民地部長薩羅（Albert-Pierre Sarraut）等人的改革調整，以「文明使命」為張目，賦予殖民地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更多參政權，但此舉仍難以抑制殖民地日益高漲的民族自決呼聲乃至獨立抗爭。另一方面，法國本土抨擊和反對殖民主義的思潮也漸漸興起，對殖民管治構

成威脅^⑤。為此，1920年代後期，法國政府有意舉行一次大型殖民地博覽會爭取民意支持，強化國民榮譽感，並向世界宣示其殖民管治的成就和正當性。因此，與1906和1922年的兩屆博覽會不同，1931年殖民地博覽會進一步擴大規模，邀請英國、比利時和荷蘭等國參展，但仍以法屬殖民地為主體^⑥。此外，該次博覽會留下了重要的建築遺產——作為永久場館的金門宮。

這座宏偉建築一洗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尷尬局面：法國是二十世紀僅次於英國的海外殖民帝國，但長期以來只有本土的地方博物館（如馬賽）出於商貿目的而展示殖民地的民俗風情；自1920年代起，就有政界人士呼籲在巴黎建造專門的殖民地博物館，以服務於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利益^⑦。1931年的博覽會無疑是上佳契機，將為博覽會而建的固定建築金門宮改造為博物館，既可以鞏固殖民主義宣傳成果，在常設場地加強國民對殖民統治的認識和支持，更可體現法蘭西的民族榮耀。



1931年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時的金門宮外觀。（圖片來源：Germain Viatte and Dominique François, eds., *Le palais des colonies. Histoire du Musée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2], 31.)

經過殖民主義者一番游說和爭取，1927年，法國政府決定在1931年於巴黎舉辦一場為期六個月的殖民地博覽會，選址在巴黎東郊的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西側，並立意隨後改造為一座常設博物館。1928年11月5日，時任法國總統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主持奠基禮，正式開始修建金門宮及博覽會設施。負責籌辦該次博覽會的利奧泰(Hubert Lyautey，1894至1902年駐守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後長期任摩洛哥總督，鼓吹殖民主義)元帥根據自身豐富的殖民地管理經驗，提出博覽會需「為帝國將來的民生和經濟發展着想」，同時金門宮要具備一般博物館的功能，即有歷史展覽部分、綜合陳列部分和招待處等設施。此外，他還別出心裁地提出在地下層建造熱帶水族館來吸引遊客^⑧。歷時半年的博覽會迎接八百多萬訪客入場參觀，盛況空前。雖然共產國際和反帝國主義者發起抵制號召，卻未造成重要影響，這說明殖民主義頗受法國等國民眾認可，並引以為時髦^⑨。

建築體量巨大、氣勢恢宏的金門宮，其設計理念迎合了1920年代發端於法國、流行全球的裝飾藝術(Art Déco)風格，正面外牆運用簡約的幾何圖案和淺浮雕，以漸次過渡的方式刻畫世界各地法屬殖民地的風土人情，尤其是航海運輸和貿易等場景，面積達1,130平方米，出自雕塑大師羅丹(Auguste Rodin)的弟子讓尼爾(Alfred A. Janniot)之手^⑩。西側外牆銘刻如下文字：「獻給那些延展了帝國精華，並由此使帝國之名在海外為人所愛慕的子民。心懷感激的法蘭

西。」在這段文字旁，臚列對殖民事業有功之人物姓名及職銜^⑪。

金門宮建築平面呈正方形，以半地下層作為台基，大門朝向西南，一座右手持矛、左手托舉的殖民地女神鍍金銅像(雕塑家德里維爾[Léon-Ernest Drivier]製作，博覽會結束後搬到面向公路和地鐵站的噴泉廣場)立於台階中央，與大門處於同一直線，平添建築的威嚴感^⑫。三十二根修長立柱支撐外廊，拾級而上進入金屬大門，再步入為慶典和宴會而設的內廳，其寬敞和高度亦令人印象深刻。四周的面積達600平方米的牆面飾以彩畫，從左至右的八幅主題分別是：工業、自由、公正、科學、藝術、和平、勞動和商業，畫中內容主要是描繪法國殖民者援助殖民地民眾的不同方式，如施醫贈藥、傳播技術、建造鐵路和司法審判等，表現法國殖民主義的「教化」價值觀^⑬。而在建築前部東西兩側的兩間會客室，都採用裝飾藝術風格的家具，豪華而雅致，彰顯裝飾藝術吸收殖民地元素而形成的美學風格，其原貌保存至今。東西兩翼各有一座橢圓形會客廳，東翼會客廳壁畫以印度支那為場景，命名紀念利奧泰元帥；西翼會客廳的壁畫則取材於阿拉伯世界，命名紀念博覽會期間擔任殖民地部長的雷諾(Paul Reynaud)^⑭。

展覽結束後，在殖民地部長洛朗(Louis Rollin)等人的努力下，法國政府決定利用金門宮建築，在1935年創立法國海外博物館(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恰如同時期西歐諸國亦建造宏偉建築以展示其在殖民地的「成就」。洛朗表示，該館「是為了

展示法國殖民活動的歷史，以及殖民地和託管地在社會、經濟和藝術上的發展，將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好去處，讓青年對偉大的法蘭西有更清楚認識」^⑤。政府也在殖民主義者的推動下投入頗多資源。博物館得到法國政府穩定的財政資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逐年增長。開館初期，曾在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 任職的勒布隆 (Ary Leblond) 接替館長一職，經其努力，館藏數量達到 40,200 件，展區分為五部分：地理、旅遊、藝術；殖民地經濟和產品；歷史；文獻；水族館。地面層的歷史展區，陳列多位法國殖民先驅的蠟像或畫像，以及多面旗幟和戰利品，十分鮮明地歌頌殖民擴張的正當性。而在樓上的陳列室則有從東亞、中東和非洲多處殖民地搜集而來的禮器或實用器物，按照國別展示，以便讓觀眾迅速瀏覽「殖民地風光」^⑥。然而好景不長，1940 年法國戰敗投降後，海外殖民地的統治秩序動搖，領導「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將軍以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為基地，許諾給予殖民地人民更多權利。因戰爭之故，殖民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持續減弱。

二 解殖時期的被動過渡

二戰後國際秩序劇變，歐洲各殖民帝國難以為繼，自 1950 年代起加速瓦解。而在法國國內，戰後建立的第四共和國因阿爾及利亞戰爭失利和反戰運動而倒台，1958 年戴高樂重新執政並建立第五共和國，加快解決

殖民地問題，法屬殖民地紛紛獨立。在這種歷史環境之下，法國政府無可避免要對金門宮的展館定位作出調整。

際此法國外交和內政均頻頻出現變動之時，金門宮的命運可謂風雨飄搖。戰後殖民地部解散，時任文化部長馬勒侯 (André Malraux) 倡議將金門宮轉隸文化部管轄。為了淡化原有的殖民主義色彩，迴避輿論批評，法國海外博物館在 1960 年更名為「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africains et océaniens)，金門宮迎來全新的定位^⑦。新的主事者試圖為從殖民地收集而來的藏品賦予藝術品地位，而非片面凸顯這些地區的經濟潛能或法國在當地的「人道行為」，從而表示對前殖民地的尊重。然而，替代殖民帝國的法蘭西聯盟和法蘭西共同體都以失敗告終，加上主要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在 1962 年獨立和其他非洲法屬殖民地紛紛走向獨立的政治現狀，結果還是對這座改頭換面的博物館造成衝擊——法國要以怎樣的姿態面對非西方文明？國內博物館是否需要完全去除殖民主義的殘存色彩？時任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館長弗洛里索內 (Michel Florisoone) 曾提出質疑，認為割裂殖民時期的歷史，不利於維持強調語言和文化相通的法語國家圈 (Francophonie) 之間的聯繫^⑧。

但隨着世界去殖民化的演進，博物館的定位無可避免再度調整。1970 年代，歐洲多家民俗學博物館先後以新的視角審視自身定位，尤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 (Tropenmuseum)、德國柏林達勒姆

(Dahlem) 的民俗學博物館 (Ethnologisches Museum) 和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的轉型為代表。與此同時，法國政界和學界也對「如同動物園般的人種博覽會」——1931年的博覽會進行更為廣泛的討論，批判當年法國政府將殖民地人民及其風土民情當作展品來展示，宣揚法國殖民擴張所得的民族學和人類學收藏成果，形成文明與野蠻的對立¹⁹。

在這股潮流推動下，1977年建成的巴黎蓬皮杜中心 (Centre Pompidou) 開始引導法國各大文化機構對殖民遺產的反思，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通過購買和各方捐贈 (而非昔日的殖民掠奪) 逐漸增加藏品數量，並在1980年調整非洲部分的藏品陳列，嘗試以更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展示非洲藝術，按照獨立後的國家政區而非殖民地範圍來展現其成就和價值。上世紀80至90年代，博物館舉辦多場有關大洋洲群島和非洲尼日爾、突尼斯、尼日利亞等國的專題展覽，以「藝術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踐來深度展現當地民眾的藝術文化，從而彰顯法國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試圖摒棄過往輿論批評的獵奇式種族主義，形成新的博物館學」²⁰。

二十一世紀之交金門宮何去何從，與法國第五共和國時期的博物館政策緊密相關。自1970年代開始，蓬皮杜 (Georges Pompidou)、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以及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總統相繼推出文化建設計劃，興建或改建多座博物館。1990年，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被定為第十二個國立博物館，更加突出其藝術定位。基於後殖民精神將既

有文化遺產與當代法國社會進行再連結，以及反思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文化共享理念，1996年前後，倡導人類文明平等對話的希拉克提出合併兩個主要人類學博物館——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與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並於1998年動工建造綜合性和嶄新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整合原來館藏文物，鼓勵學者、藝術愛好者、教育工作者和文物原屬國的人民共同分享和進行合作²¹。

2003年，大洋洲及非洲藝術博物館正式關閉，館藏大多轉移到這座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正如2006年希拉克在揭幕演講中所言，新的博物館向原屬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人民的藝術品「歸還正義」，也反映了法國多年來一直探索如何在博物館解說殖民歷史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希拉克的文化政策深受著名雕塑家格查奇 (Jacques Kerchache) 的影響，後者在1970年代提出揚棄帶有歐洲中心主義和貶義的「原始」(primitif) 一詞，轉而使用「第一」(premier) 來表示早於西方出現的藝術。定位為公共機構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於2006年開幕，以保存和弘揚四大洲藝術和文明為責任，建立廣泛國際合作，獲得業界和社會的認可，參觀人數逐年增長²²。

三 法國社會核心價值與移民問題

據歐洲統計局數字，2010年定居法國的移民達七百多萬，佔總人口的11%，超過歐盟各國平均比例，約三分之二來自歐盟以外地區²³。戰

後法國基於政治和經濟目的大舉吸納移民，既有處理前殖民地事務的需要，亦有勞動力需求殷切的考慮。但是自1980年代起，法國民眾愈來愈關注移民定居法國後帶來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收入處於中下層的民眾逐漸將法國經濟不景氣（如增長滯慢和失業率高企）和治安等社會問題與民族主義相聯繫，產生排外情緒。相當一部分選民在歷屆地方選舉、議會選舉和總統大選中投票給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促使各主流政黨在移民問題上闡明主張，亦使得移民問題屢屢成為政界和社會核心議題。讓外國移民接受法國公民認同和「同化」是國家政治價值觀（共和原則）的體現，但法國又提倡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導致兩者之間的衝突在民主政治的運行中加劇²⁶。為了回應社會關切，促進民眾對移民的理解和尊重，一些學者和社會人士籌組「移民博物館促進會」（Association pour un Musée de l'immigration）等民間團體，提出建立一座移民博物館，保存移民的文化遺產，反擊種族主義，並且重新書寫法國史，使民眾轉變觀念，從文化上接納移民²⁷。

經過數十年的社會討論和政治爭拗，移民問題，尤其是來自北非和中東的四百多萬穆斯林移民及其後代難以融入法國社會的現狀，使得法國社會再度重視同樣是問題叢生的殖民歷史和移民歷史之間的關聯。既然金門宮歷經周折「卸下」殖民時期的包袱，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時期的藏品將要併入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接下來該怎樣使用這個既已建成、位於巴黎而又甚具象徵意義的建築？推動建立

移民博物館的團體看到這種可能性，並積極與政界人士展開合作。密特朗執政時期的文化部長杜蓬（Jacques Toubon）努力協調政府部門，促使金門宮走向第三次重生。恰逢1998年法國贏得世界杯足球賽冠軍，隊員多為黑色或褐色皮膚的移民後代，引起社會熱議。記者貝爾納（Philippe Bernard）和歷史學家韋爾（Patrick Weil）趁此機會寫信給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建議籌設移民博物館。若斯潘正面回覆提議，並將草擬計劃的任務交給文化部博物館司，但博物館司以缺乏適合館藏和民眾不感興趣等理由將計劃擱置²⁸。

建館轉機出現在2002年，當年希拉克擊敗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贏得總統大選，當選後積極回應建立移民博物館的訴求，委任杜蓬主持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計劃將金門宮重新改造為一座移民博物館。同時，邀請移民研究專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如摩洛哥裔移民亞扎米 [Driss El Yazami]）加入，以求凝聚共識和確立定位。這些人士認為移民博物館的使命是弘揚外國移民對法國的貢獻，承載移民歷史的公共記憶，並強調法國自十九世紀起就有接納移民的傳統，以求正向引導社會輿論²⁹。經過討論和研究，杜蓬於2004年提交報告書，提議在金門宮建立一座結合移民歷史的博物館、資料中心、藝術展示中心、文化活動場所和國際研究網絡的綜合文化機構³⁰。杜蓬在推行其建館計劃時，遭到國民議會的若干政客質疑，認為將有損金門宮所蘊藏之法國「文明使命」的歷史意義；亞扎米則回應，這座新

展館可以有助培育移民的愛國心，讓社會達致相互妥協，形成更廣泛的公民身份認同²⁹。

經過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文化決策和政治博弈，金門宮在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關閉後的2004年改建成為「國立移民歷史城」(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其後閉館進行三年的裝修和布置，復於2007年低調地開門迎客。以「城」(Cité)而非「博物館」(Musée)命名，說明經營團隊仍須爭取文化部的認同和社會的支持。幸而法國知識份子大多讚揚這一新館促進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認識和互動，對抗種族歧視和重塑國家價值，以及其對於增強國內團結的意義³⁰。國立移民歷史城經過七年的順利運營，妥善回應社會對於選址等問題的關切³¹，又適逢左翼政府上台執政，終於在2014年12月15日由時任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主持揭幕，正式宣告定名為「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也得以升格成為國家級的公共機構³²。移民歷史博物館所要述說的不僅是作為社會史一環的移民史，並且是由移民史為敘事軸線的法國史。這座博物館不僅需要傳遞對於不同歷史群體的新認識，也在建構新的社會關係。概言之，既要引導國民轉換看待移民的視角，同時亦需轉換他們觀看法國的視野，重新理解法蘭西國族的構成基礎³³。

歷經殖民地博覽會、海外博物館、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和移民歷史博物館的八十載變遷，金門宮的外部牆面裝飾和內部結構大體不變。

今日的移民歷史博物館的空間結構分為地面層、夾層、一層和地下層。地面層主要用於接待，中有一座大廳，兩旁有圖書資料室和衣帽間；夾層位處大廳兩側和樓梯處，展示殖民地博覽會時期的文獻和實物；一層面積寬敞，有常設陳列區域、臨時陳列區域和捐贈廳(Galerie des dons)等不同分區；地下層仍是熱帶水族館，歷年來在殖民地博覽會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

為了吸引更多訪客參觀，移民歷史博物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策劃展覽。名為「座標」(“Repères”，該詞為複數形式，表示法國移民歷史的多元性)的常設陳列區域佔地面積達1,100平方米，以編年史的敘事方式全面展示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移民遷入和定居法國的歷史，內容大致分為三部分：移民遷徙的原因和旅途；移民在法國的日常生活、工作、求學和社會參與，以及其獲得國民身份的過程；移民為法國帶來的多元文化，體現在語言、信仰、藝術、文學和音樂等方面。臨時陳列區域的專題展覽往往每半年更新一次，2017年關於意大利移民的「你好意大利！」(“Ciao Italia!”)展覽頗受歡迎，引起主流媒體紛紛報導，增進大眾對博物館的了解：該展覽佔地面積600平方米，展出個人物品、藝術品、報章、地圖、電影片段等各類展品四百多件，講述意大利移民自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大量移居法國東南部和巴黎等地區的歷程，以及其在音樂、餐飲和藝術創作等方面對法國社會文化的影響³⁴。這一專題展覽恰濃縮了博物館所要傳遞給民眾的信

息——法國接受國外移民由來已久，不同背景的移民為法國的經濟發展和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筆者認為，個體歷史與公共歷史並舉是貫穿在移民歷史博物館展覽空間的一個重要理念。展覽固然以歷史事件為綱要推進敘事，但並非將移民視作面目模糊的集體，而是通過多種方式讓個體發聲說話，融合多個故事共同演繹歷史敘事。就現場布置而言，實物放在展櫃中，周圍張貼或豎立平面展板，還有自天花垂落的幡布或投影幕布，更有若干處模擬實景和裝置藝術，以「移步換景」的創意劃分不同展區和引領參觀路線，音效、燈光和標示指引等硬件以及法英雙語的文字介紹亦相得益彰。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開闢了一處捐贈廳，專門展陳社會各界捐獻的個人物品，體現人生軌迹迥異又各具代表性的移民個體歷史。例如藏品中有一本偽造護照，從中可見物主的顛沛流離：卡巴(Fodé Kaba)來自前法屬西非殖民地幾內亞，當地於1958年獨立後，在法國求學的卡巴繼續留下，但卻飽受社會敵意——因為幾內亞執政者杜爾(Sékou Touré)出於親共的外交政策而拒絕加入戴高樂倡議的法蘭西共同體，兩國更在1965年斷交。此後，卡巴為了報效祖國而攜妻帶子回到幾內亞，卻遭到當地政府懷疑，無奈之下只好購買偽造護照倉皇逃回法國。當他在1983年再度返鄉，父母均已離世，殊為可歎。卡巴的故事可說是法國解殖時期的一個典型縮影，反映非洲移民遭受的種種不公和艱難，以及法國社會對移民的長期排斥和歧視。如今這件藏品存放在歷經三度轉變的金門宮，其承載的歷史更

加別具意義。捐贈廳內類似的展品不在少數，移民歷史博物館以收集和整理眾多各具代表性的移民個體歷史展品為使命，正在為當代法國人匯聚關於移民的公共歷史。

該館團隊同時重視學術研究、公眾教育和推廣。每場專題展覽均同步出版圖冊，迄今共出版十六本，成為頗有價值的資料系列。經過法國政府協調，自2007年起，移民歷史城接收創刊於1965年的《人類與移民》(*Hommes et Migrations*)雙月刊，並連續出版六十多期，登載各類探討法國和全球移民相關議題的文章。對於研究者而言，2010至2014年間擔任館長的格魯森(Luc Gruson)及其同事撰寫、並由杜蓬作序的著作《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一座博物館的誕生》(*Le 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Genèse d'un musée*)非常值得參考，可以由此了解建館前後各方的博弈和努力付出^⑥。此外，金門宮地處巴黎東部「綠肺」凡仙森林的入口處，此地平時吸引許多市民和遊客來訪，於是移民歷史博物館利用地利之便，經常舉辦藝文和親子活動，如音樂會、作家講座、創意市集和手工製作工作坊等，使得昔日展示國家威嚴的金門宮更加平易近人，吸引來源更廣泛的訪客到臨。

四 結語

歷經變遷的金門宮始終與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的法國時勢緊密相連，焦點由外向的殖民擴張轉為內向的移民問題。2020年5月，美國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P. Floyd)之死觸發美國、

歐洲各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浪潮，也促使左翼民眾要求清除長達數個世紀的殖民時代所留下的種種印記和遺存，不少涉及奴隸販運和殖民擴張的歷史文物遭到激進示威者破壞，或被收藏機構從展廳撤回庫房。為此，法國總統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在6月曾表示支持民眾對平等的追求，但是「共和國不會忘記我們歷史上的任何痕迹或名字，不會毀壞雕像。我們需要清醒審視整個歷史、整個記憶」^{③⑤}；他呼籲國民正視歷史，試圖平息激進示威者「矯枉過正」的行為。承載殖民歷史與記憶的移民歷史博物館和布朗利碼頭博物館亦難免捲入爭議。7月，五名非裔退伍軍人盜竊布朗利碼頭博物館一件剛果文物以「歸還非洲」，後被判刑和罰款，引起輿論關注^{③⑥}。由此可見，如何保存和展示殖民時代的文物，仍深受當今時局和社會議題的影響。依筆者淺見，法國移民問題或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仍將與政治、國際關係和經濟民生等因素相伴相隨，繼續為法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帶來挑戰，博物館等文化領域無可避免成為各方較量的角力場。

註釋

① 轉引自 Pierre Magnan, "Quand la France célébrait son empire colonial à Paris en 1931" (9 June 2019), www.francetvinfo.fr/monde/afrique/culture-africaine/quand-la-france-celebrait-son-empire-colonial-a-paris-en-1931_3472897.html。

② 希拉克在2006年6月20日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揭幕詞，後製成碑銘鑲嵌在博物館接待大廳。

③④ "Inauguration du 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www.histoire-immigration.fr/histoire-du-musee/historique-du-musee/inauguration-du-musee-national-de-l-histoire-de-l-immigration.

④ 羅景文：〈誰的富強之業——中、日、越三國對於1902年河內博覽會的觀察與書寫〉，《新史學》，第29卷第4期(2018年12月)，頁125。

⑤⑥ Vincent Bollenot, "'Ne visitez pas l'exposition coloniale!' La campagne contre l'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de 1931, un moment anti-impérialiste",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vol. 18 (January 2019): 69-100; 81.

⑥ Theresa A. Leininger-Miller, *New Negro Artist in Paris: African American Painters and Sculptors in the City of Light, 1922-1934* (Piscat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54.

⑦⑧⑨⑩⑪ Germain Viatte and Dominique François, eds., *Le palais des colonies. Histoire du Musée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2), 25; 26; 183; 34-38; 205.

⑩ "The Bas-relief on the Facade of the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www.palais-portedoree.fr/en/bas-relief-facade-palais-de-la-porte-doree.

⑪⑫⑬ 陳瑞樺：〈一方記憶之所的流變與重構：以法國國立移民歷史城創設為核心的考察〉，《文化研究》，第17期(2013年9月)，頁18；26；8。

⑫ "The Colonial Exposition of 1931", www.palais-portedoree.fr/en/colonial-exposition-1931.

⑬ "The Forum Frescoes", www.palais-portedoree.fr/node/10070.

⑭ "The Historic Rooms", www.palais-portedoree.fr/fr/node/10068.

⑮ Alain Seksig, "Du musée des colonies a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fricains et océaniens”, *Hommes et Migrations*, no. 1117 (December 1988): 38-41.

⑲ 西曼 (Johanna Siméant) 在復旦大學講座「法國在非洲的殖民」的演講稿，2019年12月13日。

⑳ Étienne Féau, “L’art africain au musée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collections et perspectives pour le musée du quai Branly”,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39, no. 155/156 (December 1999): 923-38.

㉑ 曹之鵬：〈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的建館與展示構想〉，《博物館學季刊》，第15卷第3期(2001年7月)，頁59-63。

㉒ 陸仲雁：〈世界藝術傑作生來就自由和平等——談法國前總統席哈克催生的國家凱布朗利—賈克·席哈克博物館〉(2020年2月6日)，典藏網，<https://artouch.com/view/content-12136.html>。

㉓ “Foreign Citizens Made up 6.5% of the EU27 Population in 2010 Foreign-born People Accounted for 9.4% of the EU27 Population” (14 July 201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_11_105.

㉔ 宋全成：〈論法國移民社會問題的政治化——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10-16。

㉕ Marie Poinot, “Droit de Cité pour les associations. Entretien réalisé par Marie Poinot avec Driss El Yazami”, *Hommes et Migrations*, no. 1267 (May-June 2007): 102-11.

㉖ Marie-Claude Blanc-Chaléard, “Une Cité nationale pour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Genèse, enjeux, obstacles”,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92 (April 2006): 131-40.

㉗ Dominique Schnapper, *La France de l’intégration: Sociologie de la nation en 1990* (Paris: Gallimard, 1991), 10-11.

㉘ Driss El Yazami and Rémy Schwartz, “Rapport pour la création d’un Centre national de l’histoire et des cultures de l’immigration” (22 November 2001), www.vie-publique.fr/sites/default/files/rapport/pdf/014000807.pdf, 13.

㉙ Anouk Cohen, “Quelles histoires pour un musée de l’Immigration à Paris!”, *Ethnologie Française* 37, no. 3 (2007): 401-408.

㉚ 一些意見質疑為何選擇殖民歷史的遺產金門宮，委員會成員回應殖民歷史是移民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故不必迴避。參見 Benjamin Stora, “L’immigration, au-delà de l’histoire coloniale” (12 October 2017), www.liberation.fr/debats/2017/10/12/l-immigration-au-dela-de-l-histoire-coloniale_1602708。

㉛ Aurélie Vertaldi, “Paris: un siècle d’exode italien au musé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19 April 2017), www.lefigaro.fr/sortir-paris/2017/04/19/30004-20170419ARTFIG00048-paris-un-siecle-d-exode-au-musee-del-histoire-de-l-immigration.php.

㉜ Luc Gruson, *Le 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Genèse d’un musée*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17).

㉝ “Adresse aux Français, 14 Juin 2020” (14 June 2020), 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06/14/adresse-aux-francais-14-juin-2020.

㉞ Charlotte Herzog, “Tentative de vol au Musée du quai Branly: ‘Ce que je vous dis vient du peuple africain’” (30 September 2020), *Le Monde*, 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20/09/30/tentative-de-vol-au-musee-du-quai-branly-il-y-a-deux-proces-dans-ce-proces_6054286_3212.html.